

散落在时光里的斑驳碎片

马国平

老报人、作家徐开垒先生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,喜欢收藏,他认为自己书房有三多“书多、书信多、照片多”。十年前,徐先生逝世后,作为他的后代,时常在检视他的部分遗物过程中,感叹他的辛勤劳作。偶然,也会有意外的发现,如他珍藏的国画大师程十发先生绘制印刷的《红楼梦仕女屏》,引起了我的注意,并由此发现徐开垒曾经和程十发的一次图文合作。

这是一套四张十二幅描绘《红楼梦》女性的彩色书画条屏,共绘画了林黛玉、薛宝钗、史湘云、贾元春、贾迎春、贾探春、晴雯、鸳鸯、尤三姐、妙玉、花袭人、薛宝琴等十二人,每幅图下面有简短的释文。这套条屏画为当时人们居家悬挂张贴的装饰年画,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9月初版,印数80000套,定价0.26元。条幅高一米左右,宽不盈尺,末尾版权内容标明“程十发作”。只是纸张已经泛黄,图案线条黯然,程十发的绘画与后期的风格迥然有异。

徐开垒藏有的这两份《红楼梦仕女屏》,边角无缺,折叠整齐,包裹在塑料袋内,显示他对这个藏品甚为看重。但是,这套初版本仅见“程十发作”的字样,似乎与徐开垒毫无关系。笔者曾经也一度疑惑他如此珍藏的原因,徐开垒以往所见的文章中,似乎没有提及“仕女屏”的内容。但徐开垒收藏这套《红楼梦仕女屏》总有他的道理,也就原样存放了一年又一年。

直到去年,偶然从他遗留的来往书信中找到了谜底,发现这“仕女屏”是他与程十发先生的一次殊为难得的图文合作。红学家徐恭时在1979年5月27日曾经写信给徐开垒,邀请他写作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信中谈到“弟想

到吾兄,最早与程十发兄合作发表《红楼梦人物谱》18幅,各方面非常赞扬”。曾在上海市杨浦区档案馆工作的傅起玉1974年6月20日写信给徐开垒说,“《红楼梦仕女屏》是你的编文,程十发的画,诗画配都是出版社编辑部搞的。……这画屏在63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,是第十次印。初版是五八年九月,已经是十六年了。”

真是得之侥幸,原来“仕女屏”真的与徐开垒有关。从旧书网站上查检到“仕女屏”后几次印刷的实物,明确印有“程十发画徐开垒编文”的字样,从而印证了这是一次徐开垒和程十发的图文合作。该条屏有多次印刷版,其中的1963年1月第九次印刷,印数已经累计达到488000套。但曾经广泛发行的书画条屏,于今已是稀罕难见了。

《红楼梦仕女屏》脱胎于程十发先生在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发表的系列画《红楼梦人物谱》(1957年11月19日—1958年2月24日)、“人物谱”共计十八图,依次收录了林黛玉、薛宝钗、史湘云、晴雯、王熙凤、尤三姐、妙玉、鸳鸯、薛宝琴、贾元春、贾宝玉、贾探春、贾迎春、花袭人、刘姥姥、贾政、贾雨村、薛蟠与柳湘莲等,一图一文。“仕女屏”即是从中撷取十二位女性编辑刊行的,当然,这些绘画在那时的报纸上是黑白印行的,“仕女屏”则是彩印的。

在报纸连载的《红楼梦人物谱》中,如徐恭时信中所说,由徐开垒配以文字。他以《红楼梦》目录为题释画,署名为“门”,他当时以“孟新”笔名发表新闻报道、散文作品和连载小说等,“门”和“孟”有谐音之义。“人物谱”和“仕女屏”的两者关系,“图”与“文”前后衍变可资证明。徐开垒的释文前者详后者略,但所叙事例和行

文特色则一脉相承。如“人物谱”中所叙鸳鸯:鸳鸯是贾母房里的一个大丫头,当贾赦叫他的妻子邢夫人去向她说情,要收她做妾时,她立刻拒绝。即使当着贾母的面,她也直说:“……就是老太太逼着我,一刀子抹死了,也不能从命。”等到贾母逝世,鸳鸯深知自己必然将落入贾赦的魔爪里,因此就悬梁自尽。“仕女屏”的文字则较为简略:鸳鸯是贾母房里的一个大丫头,她抗拒“大老爷”贾赦要娶她为妾的行动,是表现得十分坚强的。她说:“一刀子抹死了,也不能从命!”贾母逝世,她深知贾赦会迫害她,因此就悬梁自尽了。

在“人物谱”的配图文字中,徐开垒以每篇三百至五百字的篇幅(合计七千多字),诠释他对《红楼梦》的认识,融入了他研读《红楼梦》在文学创作上的理解和领悟,以及对版本演变的熟稔程度。

“……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妙玉形象,看来好像一直是一个超越尘世的‘槛外人’,但曹雪芹寥寥几笔描写妙玉青灯古殿生涯的文字,背后却隐藏着对这个被封建社会蹂躏下的少女的无限同情。他每次描写妙玉总是在大观园的少男少女欢聚之后出现,表面上好像衬托出妙玉的淡泊与超逸,实际上是强烈地对照地显出她的青春的被埋没和被摧残。

曹雪芹这样集中笔力来描写她,看来这个人物原必然有其下文的。可惜的是在高鹗所整理的续四十回中,却把她忽略了。这恐怕是和高鹗忽略小红一样(曹雪芹在前八十回曾刻意描写过小红,而四十回中小红却下落不明。)为读者所不满意的罢?”

对于身为散文作家和文艺副刊编辑的徐开垒来说,这似乎是他有关“红学”的用心之作。也许是当时“红学”是显学的时代背景使

然,他对《红楼梦》的关注和研究,贯穿于职业生涯之中,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新时期后,徐开垒针对当时“红学”研究的一些现象,撰文发表了《〈红楼梦〉研究的题外话》,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以及各方面的反响。叶圣陶先生来信说:“尊作谈红楼研究之文,我非常钦佩,因为我深有同感,而足下畅达言之,实获我心。”红学大家周汝昌1979年4月12日即来信直抒胸臆:“足见人心自有公道,以弟三十余年经历察之,群众并非无所感、无所见、无所欲言,只以处境、顾虑、心情、层层关系,大抵未必肯公开发言。一见兄文,言其欲言,遂尔感其仗义直言之为可敬可风。”周汝昌先生还引用了一位大学教师的话说,“文章虽小,却很红火”,并说“徐开垒”为笔名,“垒台(擂台)徐开之谓乎”。让人解颐一笑。徐恭时当时也来信称赞和期待有续篇,并传递了红学界各方面的反应。

徐开垒对《红楼梦》素有研究,藏有多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不过论述不丰,后来又回归到对小说本身创作艺术的探索,如《提倡红学与美学结合》《从林黛玉的性格描写看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》《关于电视剧〈红楼梦〉答客问》等。当时,徐开垒参与了红学界的一些活动,如1982年10月在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(现上海师范大学)召开的规模盛大的全国《红楼梦》学术讨论会。他与魏绍昌、胡文彬、张毕来、马国权等红学界人士都有信函来往,上述“林黛玉的性格”一文校样还曾经请张毕来“指正”过。

对《红楼梦仕女屏》及相关文件的考索,发现了徐开垒久已埋没的佚文,并将他对《红楼梦》的写作研究,前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散落在时光里的逝者的斑驳碎片,给予后人复盘拼图的机会,意外地还原历史真实。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,于心可以告慰矣。



程十发《红楼梦仕女》

编辑往事

柳士同

作者与编辑,大概是自有出版业以来,天造地设的“一对”。

我认识的第一位编辑是《青岛日报》的章铁铭,他偶尔约我写个小通讯之类的东西,几百字,连短文都算不上。我真正发表作品是上世纪70年代末,结识的第一位文学编辑是《雨花》杂志诗歌组的黄东成。他在编辑我的诗作时,特意从南京到镇江去找我,可我当时出差在外,未能晤面。回来后听说有编辑来访,心中不免惴惴,于是,我第二天就去了南京,造访了设在清末太平天国王府内的《雨花》编辑部。东成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,并说明了他去探望我的原因。他说,看你写的诗,功底不错,不像是初学者,可江苏的诗人我们都知道,从未听说过你的名字,所以想去看看你。又说,你的另外几首诗也安排了,准备以后陆续发表;还说,他跟镇江文化馆打招呼了,你写作上有什么需要尽管找他们。听了他这一席话,我心里很感动,从此把他当作我的良师益友,直到现在。我对《雨花》的其他编辑也都满怀感激之情。特别想提一下《雨花》的主编叶

至诚,他的人跟他的名字一样:“至诚”,感人至深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曾寄给至诚先生一篇小说稿《八月八》。那几年不知怎么回事儿,《雨花》编辑部似乎“居无定所”,搬来搬去,有些稿子便在搬家中不慎遗失了,其中就有我的《八月八》。其实,很多刊物,作者寄去的稿子不予回复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“稿约”上都明白白写着“三个月未接通知者,可另行处理”。没想到的是至诚先生却给我寄来一封写满一页纸的道歉信,他的发自内心的自责真让我感动和过意不去。

我认识的第二位亦师亦友的编辑,是《诗刊》社的雷霆。大约是1980年的时候,他去上海组稿,九叶派者宿王辛笛先生跟他谈起我的诗歌创作,同时,北京的巫宁坤先生和杜运燮先生也介绍了我,于是他就来信向我约稿。陆续编发了我的几首诗后,他又安排我到外地采风 and 体验生活,多方面为我提供写作条件。1984年,他借去济南的功夫,特意向济南的老诗人孔林先生和桑恒昌先生推介了我。1985年

《黄河诗报》创办时,孔、桑二位先生,竟在创刊号刊登了我的组诗、照片和创作谈。之后,他们又请丁振家先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《似花还是非花》,推介我的那组诗。对于这些扶植我走进文学界的编辑老师,我始终满怀感恩之心,没齿难忘!

上世纪80年代,《诗刊》好几位编辑都编发过我的诗,我去北京他们来青岛,都少不了见个面,在一起谈诗谈文学,唯当时一度主持《诗刊》日常工作的邵燕祥先生从未谋面。但他好像也一直记得我,十几年前,他在给青岛的刘禹轩的一封信中,还特意提及:“柳士同先生曩在诗刊工作时,多次刊发他的诗稿,记得曾有书信往来。他的字写得极工整,印象深刻,还记得诗人杜运燮曾介其诗稿来,不意其已年近古稀也。”不仅邵先生我未曾谋面,在我几十年的写作中,还有更多的素昧平生,甚至连姓名性别都一无所知的编辑,给我以支持和帮助。1979年10月,《星星诗刊》复刊,寄了两首诗去。但寄出后将近半年不见动静,心中不禁有点失落。可没想

到第二年的三月底,忽然收到了该刊的回信,信的内容大意是,他们收到的稿件太多了,实在看不过来,这两天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发现我的来稿,将在近期编发。信末没有署名,我也就无法得知编辑是哪位先生或女士了。直到上个世纪末,《星星诗刊》主编刘滨和编辑李自国、萧融一行来青岛,这才见面相识。那时,曾编过拙诗多年的蓝疆先生已经退休,退休前他曾来信“告别”,谦虚地说,遗憾以后不能再为我“效劳”了,我更是为始终未能见到他而遗憾。

还有《社会科学论坛》的主编赵虹先生,投稿至该编辑部,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他的亲笔回信,不仅通知我稿件已采用,还把他的私人邮箱告诉了我,从那以后我和他就经常联系。遗憾的是,直到前年赵虹先生退休,我也没去拜访他一下。

细数起来,未曾谋面的编辑实在是太多了,但他们对我寄去的稿件,每一篇都认真地审阅,即使不能采用也会在信中或电话里跟我说明和交流。忆及与他们的交往,我受益良多,受用一生。